



蘇曼殊新論

蕙冰

(一)

在四年前，曾買了一冊柳亞子編的曼殊全集，我曾深深地被這位「尚留微命作詩僧」的和尙感動，那時自家的年齡尚幼，感情的動性特別強烈，被這許多浪漫頹廢的作品一灌，無端引起不少的不相干的閒愁，不過已是「昨日黃花」，屬於過去的事了。這回偶然在書攤上又買到了一冊曼殊全集，重使我對於這位先生發生濃厚的興趣。

曼殊這名字，只要稍微關心文學的人都知道的，他的詩那樣清快柔美，誰都高興去唸唸的，至低，他在清末的文學史上，有他一個相當的位置。

我們以現在的立場，來對於這位詩人重新估價是必要的，而且這位先生一生的「羅漫司」，也是很叫人夠味。

(二)

曼殊據大家知道的，他是中國與日本的合種，父親是廣東人，母親是日本河合氏，因父商於扶桑，與日女和合氏結婚而得曼殊；可是又有人說他純是日本血統，於是就生了問題，大家各持其說鬧了一大堆。

據柳亞子的「蘇曼殊新傳中」說「……玄瑛，字子穀，小字三郎，始名宗之助，其先日本人也，王父忠郎，父忠郎，不詳其姓，母河合氏，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，生玄瑛於江戶；玄瑛生數月而父歿，母子孑孑靡所依，會粵人香山縣蘇某商於

日本因歸焉。」所謂香山蘇某，不過是曼殊的寄養父而已；柳氏在「蘇玄瑛傳」里發現自己的記載完全錯了，「荒略過甚」，所以才不好意思地完全翻案而寫新傳，張慧劍在「蘇曼殊的國籍問題」一文里說：「柳氏能武斷地作蘇玄瑛傳，仍不難武斷地作新傳，」他是極力想把這位詩人奪回中國主權的，不過我想柳先生既自己知道錯了，「意不自慊地」把從前自己的話一筆勾銷，決然作新傳，他決不會又像從前那樣又是一陣武斷，等一會又要「意不自慊地」作「再新傳」的；而且柳氏既然能武斷肯定了蘇玄瑛傳，那他可以不必要再作什麼新傳了。柳氏新傳是根據曼殊的小說「斷鴻零雁記」與日僧飛錫的「潮音跋」，「斷鴻零雁記」是小記，雖然是自傳體，但「所記固屬子虛」，（「曼殊與半農書」），不足為信，我們也可以不去問他的是非，至於「潮音跋」的作者是否是日僧飛錫，飛錫到底是不是曼殊自己的借名？丁丁在「詩僧曼殊」里肯定飛錫是曼殊的化名，而來迴護他母親的再嫁；我以為曼殊不沒有意思去迴護他母親的再嫁，既使我們完全信服了「潮音跋」，無論如何曼殊也不能使他母親與香山蘇某脫離關係，而曼殊也不能寫「嗚呼廣東人，」大呼其「我廣東人！」「我廣東人！」了！因為他母親既嫁了香山蘇某，於是他因「寄父」回廣東而入廣東籍是可能的；所以他也就把「宗之助」、「三郎」改為「蘇玄瑛」字「子穀」，永遠作了個中國人。至於「潮音跋」作者是不是曼殊自己，或飛錫實有其人，已無法證實，總之，「潮音跋」不可據」而說「潮音跋」里面所說的

也「不可據」，是錯誤的。跋上知日僧飛錫是金閣寺僧人，與玄瑛有遠親關係，「潮音集」是其代刪曼殊舊作而成，或許飛錫真有其人，亦意中事。總之，「潮音跋」不管是曼殊自作或日僧飛錫所作，其說曼殊王父忠郎，父宗郎，日本生，而寄養於香山蘇某，決不是憑空可以造得來的；如果出於別人故意造曼殊先生的謠言，曼殊決不會用跋自己的作品的。而且當曼殊同他「寄父」蘇某同廣東時，「族人以子穀異類，羣擯斥之，」如果曼殊是蘇某的親生子，雖然「廣中重宗法」，決不能那樣殘忍地「羣擯斥之」爲「異類」也！張慧劍又說：「……曼殊是富於感情的人，……母愛深深地牢築在他心頭……至於他的生身的父親粵商蘇某，却被他隔膜得十分利害，……」的確，曼殊對於他的母親處處流露淒傷的愛護，而對於蘇某簡直很少提到，這固然因爲蘇某早死的關係，而實在蘇某是他所不願說及，因爲他母親的再嫁蘇某而託養曼殊，在他決不是件榮耀的事；假使蘇某真的是他的父親，以「富於感情」的×殊，決不會對生父有什麼「隔膜」而甚至於達到「十分利害」的程度。丁丁說他「因爲遭族人之擯斥而連帶到他對於父親也沒有好感」，這尤其是不近情理的事，天下決沒有一個兒子因爲別人的攻訐，而與自己父親引起什麼「沒有好感」來。

總之，曼殊是不是中國人，倒不必費了一肚皮力去爭奪，反正他在中國文學上的成績，決不因爲他是日本人而失其原有的光彩！

(三)

照例凡是所謂「詩人」，都是有幾分「詩人氣」的，我們這

位「無端狂笑無端哭」的曼殊大師，自然也不能例外；原因很簡單，因爲凡一個人的生活越不平庸，他才能寫得好的詩來，才能成爲一個詩人，一個文學家，所謂「人生的經驗」豐富，才能表現出真的作品來，歌德不失戀，決寫不成「少年維特之煩惱」，陀司杜以夫斯基沒有他那種病態，下層市民型的生活，決寫不出「窮人罪與罰」而維持他終身灰色憂鬱的作風，高爾基沒在麵包店作過小夥計，也決寫不出那篇「二十六個與一個」……，總之，文學家所以提起筆來寫文章，實在是他們的心中有了一種不得不宣洩的隱疼，因爲有這種隱疼，他們的筆尖才能攤出真的淚與感情來，而後能播動讀者的心使其生同樣的共鳴。

所以我們要了解一位詩人的詩，首先不能不了解他的生活，因爲「詩」就是他的「生活」的表現。

曼殊的身價，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說他是很低，而且是個十足的上流人流，他十三歲即入上野美術學校學西畫，十五歲又入早稻田大學學政治三年，而且是「成績卓絕，試冠其曹。」（「泪紅生」記曼殊上人）十九歲更能得清註日大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在成城學校學陸軍八月，二十歲就開始講學長沙實業學堂，任吳中公學教授，任「國民日日報」翻譯；而且是有名的南社社員，作過「太平洋報」的主筆；與遊者皆海內名士，這些名士，像柳亞子馬君武葉楚傖卽元冲胡樸安章炳麟陳獨秀……等，皆今尤健在，煊赫遐邇者，可是我們的曼殊，至死也沒作過一官半職，而終於憂病以死。對於作官他還發了一篇皇皇大論；「山僧日醉卓氏爐前，則亦已耳！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與紅鬚碧眼人爲

伍耶！明末有童謠曰：職方賤如狗，都督滿街走。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如是！」那時章炳麟大發其官癮，榮任東三省籌邊使，洋洋得意，曼殊則謂之曰：「此公興致不淺，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，不欲見之矣！」又「前大總統孫文，玄瑛之鄉人也……期覆清社，海內才智之士，……人人願從玄瑛遊，自以為相見晚；玄瑛翺翔其間，若莊光之於南陽故人焉。及南都建國，諸公者皆乘時得位，爭欲致玄瑛，玄瑛冥鴻物外，足未嘗一履其門。」足見我們這位詩人，實在是身處羣貴之中，不過是因為早年出家，「身有難言之恫」，不好意思再作「要人」而已。所以他的詩表現於這種地位下，許多地方都脫不了這種特殊階級の意味。

他在五歲時（一八八八年民元前三三年），就與寄父香山蘇某來中國，那時的母親河合氏也同來的，因河合氏不容於蘇家夫婦，終於在玄瑛八歲時（一八九一年）又回到日本去了；玄瑛因為有個異母兄弟（註）待他很好，於是獨留；一九九四年，寄父死，時玄瑛僅十二歲，蘇婦待之更虐，而族人又以玄瑛異類，大家都不加援助，反而加以攆斥；玄瑛處此，自然不能生存，但又幼弱無能，舉目無親，除了作和尚外，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！當他懷着一顆悽苦的心走入廣州長壽寺時，他還只有十二歲。

所謂「一足失成千古恨」，也許玄瑛自「從慧龍寺主贊初大師披剃於廣州長壽寺。」（潮音跋）後，是他生命一個偉大的註定，從此他就覺得什麼事他都不願作了，覺得自己是和尚，「兩笠簾簑歸去也」就算了，何必與人「生怨」「生嗔」。但另人方面又覺得「大丈夫應頂天私地」「揚名於後世」。因這兩種矛盾

的心理互相交雜着，所以形成了他那狂癡的行為，以致變成了一個「無端狂笑無端哭」的怪漢，一回兒「華嚴瀑布深千尺，未及卿卿愛我情。」「棠梨無限憶鞦韆」，「賜爾多情書一卷，他年重檢石榴裙！」而一回兒又「懺盡情懷空色相，琵琶湖畔枕經眠」。「兩笠簾簑歸去也，與人無怨亦無嗔。」「分明化石心難定，」但是他要去「多謝雲娘十幅箋，」自知「九年面壁成空相，」但是他又「悄悄星河覓女牛！」終於他祇落得「一杯顏色和雙淚，」「尙留微命作詩僧。」「國民孤憤英雄淚，酒向綬綰贈故人！」「還卿一鉢無情淚，恨不相逢未繫時，」……

他本來知道和尚應該去苦修禮佛，但他又偏忍不住要終日徵歌逐妓，他本來知道和尚應打開名韁利鎖，但他又忍不住主編什麼「太平洋報」，又與「劉師培爲「天義報」，倡無政府主義。（柳新傳）。「初莊湘欲以雪鴻妻玄瑛，」而他又垂淚說：「吾證法身久，辱命奈何！」可是因迫於需要，又「入倡家哭之，倡家駭走。始去美利堅，有肥女重四百斤，脰大如汲水甕，」子穀先生又去求偶！他的行為竟荒謬到這步田地。其餘還有好多事，莫令人啼笑皆非。

這完全因為兩種矛盾心理衝突的結果。所以我們讀他的詩，必定要了這一點。同時這也就是他作品所以有價值的基本的存

在。他本來是個意志懦弱的人，自幼就遭遇着可憐的境遇，吃盡了人間的辛酸，受盡了人們的嫉妬與殘酷的白眼和冷視，「人類是悲慘的野獸」，在他從母親里跳出時，他就深深地感到，所以

他十三歲學美術，十五歲學政治，十九歲學陸軍，終於百無一成，我們知道他並不是天資愚鈍，實在是他不願學成功，他已把一切都看空了。他本來是個勇敢的戰士，可是上帝早就把他的心刺傷了！

曼殊所處的時代，（一八八四——一九一九）正是清末的時候，那時滿清的腐敗，人民的疾苦，處處使人感覺到失望、憤懣；那時帝國主義正磨快了他的刀，張開了他吃人的口，瓜分中國之說囂攘，加之社會的污濁，處處使人感到虛空、恐怖。社會給人們的，只有痛苦與失望，我們要生活，全靠着自己的奮鬥，從魔鬼的牙齒上來掙脫自己的生命；曼殊既然沒有像獅子樣的勇敢，自然在時代的輪子下墮落了！我們在他的詩里，更可讀到他許多自己的傷感的沉痛。這也是我們所應知道的。

社會給予他的一切都是這樣殘忍，在百劫里留給他的自然只有一條「微命」，作個「詩僧」罷了。曼殊身世所謂「有難言之恫！」的確，他的苦處，真有不能為人道者。他永遠沉浸于悲傷里，所以他只有永遠地唱着悲傷的歌。

十九世紀末，正是歐洲文學浪漫主義及頹廢主義正盛的時候，曼殊是精通歐文的，他的詩，充分地接受了浪漫頹廢的影響。也許更及于他行動的全部。

柳在新傳有一段這樣的記載：「一夜月照積雪，泛舟中禪寺湖，歌拜命哀希臘之篇，歌已哭，哭復歌，抗音與湖水相應。……」可見曼殊被拜命感動至於「歌已哭，哭復歌」的狂亂狀態，的確，曼殊與拜命身世真有許多相像的地方，當拜命立在希臘

的山上，悵望自己的祖國時，何嘗不「歌已哭，哭復歌」呢！曼殊嘗謂「拜輪猶中土李白，天才也。」可見其對於拜命的尊敬，關於拜命的詩，他曾譯了好多首成中文，如「哀西臘」「贊大海」「去國行」「答美人贈束髮帶簪詩」「星耶峯耶俱無生」；並專有「拜輪詩選」之輯。詩選自序中有云：「震旦萬事譴墜，豈復如昔時所稱天國，亦將為印度巴比倫埃及希臘之繼耳。」在他那時眼中的中國，正如拜命眼中的希臘一樣，他們為着世界美麗的文古的國家將沉淪時，他們唱盡了他們憐惜淒婉的歌，拜命遠遠地從英國跑到希臘去參加革命軍，曼殊對於他第二祖國（中國）的革命，也曾極力援助過！拜命不僅在詩歌反抗破壞和追求快樂，他的實際生活，也像他的詩一樣，其實曼殊何嘗不然，不過曼殊不能像拜命一樣拿起槍到戰場上去，因為他已經作了和尚了！

關於拜命，曼殊曾淒傷的唱道：

「秋風海上已黃昏，獨向遺編弔拜命；

詞客飄蓬君與我，可能異域為招魂。」

其餘他還極崇仰莎士比亞與雪萊彭司歌德……等人，這些都是浪漫主義的巨子，也許都是對於他們影響的人；舉個明顯的例，曼殊的「寄調筇人」兩句：

「雨笠煙簑歸去也，與人無愛亦無嗔。」

顯然是與魏爾倫的「無譜之曲」中「滿城風雨」的兩句：

「既與人無愛無嗔，又何事傷心如許。」有點像。

總之，歐洲的文學思潮，與曼殊也是有很大關係的。

（未完）